

安乐哲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国际译评反思

谭晓丽, 吕剑兰

(衡阳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2)

摘要:安乐哲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在国内大受好评,被誉为“让中国哲学讲中国话”的翻译。但其译作在英语世界究竟拥有多少热情的读者却不得而知。有影响力的国际译评主导着欧美文化语境中跟阅读翻译作品相关的舆论,影响并形塑着目标读者的阅读选择、阐释策略与价值判断。文章旨在通过论述安乐哲译作的国际译评,并结合译作的网评、销售数字及相关评价,全面分析其译作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并以此为个案来探讨如何改善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质量及其域外传播效果。

关键词:安乐哲;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国际译评;接受;影响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6)06-0081-07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国内学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具体到中国哲学英译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学界并不十分了解。已有不少文章讨论了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不过,多数研究或以原文为参照,比较译文的准确度,探讨译文特色;或以译者为重点,研究译者的个人风格及解决问题时采用的策略和方法,少有文章将视角放在读者身上,调查读者对典籍译作的阅读、使用、评价等接受情况。

谈及当代中国哲学典籍的海外英译,安乐哲(Roger T. Ames)的译作在国内可谓大受好评。他的译作注重还原中国文化特色及彰显中国哲学之独特性,被誉为“让中国哲学讲中国话”^[1]的翻译。安氏的比较哲学论著也因此倍受学界关注,几乎每一部著作都有中译本。笔者以“安乐哲”为主题检索了

中国期刊网,发现截止2016年9月24日,共有144篇文章评论了安氏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刊发在《中国翻译》、《外国语》、《哲学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在“走出去”文化战略的大背景下,安氏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一时间在国内创造了“安乐哲现象”。但是,要考察安氏译作的海外传播与接受情况,就必须着眼于其译作在英语世界的评论。

据调查,安氏的大多数译作出版后不久,美国的各种学术期刊就发表了相关评论。笔者收集了七篇,其中三篇是有关安乐哲和罗思文的《论语》译本的评论,还有三篇文章评介了安乐哲和郝大维合译的《中庸》,另一篇评介了安乐哲、罗思文合译的《孝经》。本文试根据这些国际译评,结合安氏译作的网评和销售数字,全面分析其译作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以此为个案来探讨中国哲学典

收稿日期:2016-03-15

作者简介:谭晓丽(1971-),女,湖南衡阳人,衡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吕剑兰(1982-),女,湖南邵阳人,衡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Y019);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4YJA740030);湖南省社科联项目(2011038B);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16C0239)

谭晓丽,吕剑兰

籍英译的海外接受,指出问题,提出对策。

一、故弄玄虚的术语译名——西方学者的批评

(一)忽略原义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史嘉柏(David Schaberg)为《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撰写的书评评介了6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论语》英译。史嘉柏认为,这些新近出版的《论语》译作与英语世界读者们普遍认为的中国人的性格并无多大关联,更多则是揭示这部经典的当代价值。“信”、“达”、“雅”曾被认为是翻译的金科玉律,但这些译作中,没有一部符合上述标准。换言之,每位译者都有自己的翻译目的,其中安乐哲和罗思文的《论语》英译旨在鼓励读者寻求一种实用的方法来化解中西文明的冲突^{[2]16}。史嘉柏认为安氏和罗氏的译本是西方对中国考古新发现的简帛本研究的优秀之作,肯定了两位译者在挖掘中国哲学独特内涵上所做出的努力,并认为他们的术语翻译有清晰的翻译原则,并能够一以贯之^[2]。

但史氏的批评之词也很尖锐。他指出安氏的哲学翻译建立在对古汉语“视觉假设”(visual hypothesis)的基础上,把古汉字看作一种通过视觉方式来表意的文字。这种看法忽略了古汉语的动态发展史,很值得商榷^[2]。另一方面,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视觉假设”也没能运用到《论语》具体章节的解释上,而仅仅体现在译者对一些核心词汇的选择上。而这种词汇层面的解释,根本就不能提供句法组合方面的视觉推论。最重要的是,史氏认为译者为了体现关键术语的翻译原则,贯彻自己的哲学翻译观,保持这种哲学翻译理念的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术语原义的解读。因此,史嘉柏认为译者们“一方面反对用西方哲学的本质主义倾向去诠释中国哲学,而实际上他们的翻译本身反而催生了某种中国语言和哲学的本质主义特征”^[2]。

(二)故弄玄虚

郑文君(Alice W. Cheang)是美国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研究中国古代经典的高级研究员。她撰写的书评《孔子的声音:〈论语〉的阅读、翻译和阐释》评论了4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论语》英译,其中包括安乐哲和罗思文的译本。郑文君认为,这些译本都添加了一些便于读者理解的东西,

导致原本属于读者的解释权转交给了译者,译者拥有了许多自由发挥的空间^[3]。在郑文君看来,安氏译作不遗余力地提醒读者不要掉入文化挪用的陷阱,不要想当然地把自以为正确的东西强塞进另一种文化。可是,尽管“goodness”和“benevolence”这些常用的译名都不是“仁”的最佳对等词,它们至少向英语读者传递了一些有意义的信息,而安氏的“authoritative conduct”却让读者一头雾水。还有“government”一词,尽管它具有西方法律的色彩,不适合用来作“政”的译名,但安氏的“governing properly”很难说是一个改善。而且,安氏的术语翻译可能过分强调了两种文化的差异性^[3]。

(三)选择挪用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麦克汉姆(John Makeham)撰写的书评评论了1998年在美国出版的两个具有浓厚学术特色的《论语》英译本,一个是白牧之和白妙子(Brooks, E. Bruce & A. Taeko)夫妇的译本,另一个就是安乐哲和罗思文的译本。总体说来,麦克汉姆对安氏、罗氏的《论语》英译评价颇高,他认为译者将该典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论语》的众多译本中占有一席之地,值得研究中国的学生认真研读^[4]。而且,麦氏赞同译者把英语看作物质性的语言,把古汉语看作关联性、事件性语言的这一区分。他还认为译者的翻译水平很高^[4]。不过,麦氏的批评意见也不少,他对译者有关文字辨析及文本解读的假设提出了质疑。麦氏质疑原本作为孔子教义的可靠来源这一假设^[4]。他认为,作为一部经典,《论语》的意义不可能局限在一个有限的时间范围内。给文本贴上“原”意的封条,就等于否认了文本意义是在阅读中产生这一过程。他相信,经典的意义是开放的,期待着新的解读^[4]。麦氏还对译者们提出的以视觉的方法解读古汉字的论断表示质疑,认为这与他们依据总体语境来解读文本意义的观点相互矛盾^[4]。最后,麦克汉姆对个别术语的译名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译者们从古代中国哲学中选择性地挪用了一些能够解决当下问题的元素,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哲学的本原精神。例如,“道”这一术语译名“way-making”的动态性是译者强加上去的^[4]。另外,把“生”译做“natural propensity”有些牵强,违背了中国古代对“气”的认识。

(四)以辞害义

肯塔基伯利尔文理学院的雷切瑞 (Jeffrey L. Richery) 在《中国哲学》(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上评论了安乐哲和罗思文的《孝经》英译。雷切瑞认为, 安乐哲与罗思文把《孝经》从文本语境中分离出来, 放置在普遍性的话语之中, 强调其输出的是一种与西方的“德性伦理”相对的“角色伦理”, 致力于为儒家思想在全球哲学界开拓出一席合法领地。雷切瑞引用《孟子·万章上》中的段落, “说《诗》者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 提出解读文本的原则, 即解读者不要拘泥于辞义, 而误会、曲解作者原意。他认为, 安译《孝经》对一些“特别的术语”所做的“高雅的译名”破坏了这部典籍的原意。例如, 译者把用来描述儒家“角色”的传统词汇, 如“superiors”和“inferiors”替换成“benefactors”和“beneficiaries”, 还把“仁”译作“authoritative person”, 使得读者不明其意。这些所谓“高雅”的译法, 显得更像一件粗俗的、不合体的文化外衣, 导致他们将术语从文本语境中剥离出来, 与现实格格不入^[9]。不过, 雷切瑞认为, 尽管存在以上缺陷, 安氏和罗氏的译作还是有许多地方可圈可点。例如, 译作提供了中文原文和关键词的译名, 长达 8 页的参考文献包含了许多有用的引语。另外, 译者对儒学有精辟的认识。这对于学生读者来说既新颖又有益^[9]。

以上几篇均是西方学者对安氏译作的评论。不难看出, 他们对安氏译作不乏溢美之词, 如承认其有创新的解释, 并一致认为翻译的“质量高”。但是, 批评多于欣赏, 反对意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认为译者运用的理论有自相矛盾之处; 二是批评其哲学术语的译名不知所云, 或故弄玄虚、以辞害义。这些评价是否公允尚且存疑, 但它们对美国乃至英语世界读者产生的影响却可想而知: 一群供职于世界名校、专事中国研究的专家学者在权威的中国研究期刊发表的批评意见, 有多少非专业人士的读者能够反驳呢? 除书评之外, 一些通过报刊、网络和社会会话等渠道发表的有关安氏译作的其他各种评论也表达了相似见解。

例如, 美国的《出版周刊》(Publisher Weekly) 为安乐哲和郝大维的《道德经》译本做宣传时明确表示: 译者关于中国哲学的预设“并不很有说服力,

似乎有矫枉过正之嫌”^[10]。笔者在亚马逊图书网上调查安氏《道德经》的接受情况时, 看到网评上反对派的意见: “译者似乎故意在写作中使用一些晦涩难解的所指, 并选择了最复杂的词汇和句型来表达其思想”^[7]。有读者认为安氏译本“让‘道’变得更难理解”^[7]。笔者曾与一位名叫 Susan 的美国读者通信, 她是一位热爱中国哲学, 并对《易经》有着长年研究的老太太。在信中, Susan 说道: “安教授的《道德经》译作令人迷惑不解, 让我更难把握原作的内容”。“说实话, 我不认为有任何必要使得术语复杂化。例如, 把‘正’译作‘optimal appropriateness’显得很造作。这样的译名把读者和文本的距离拉得更远”。

二、中国哲学术语英译的新途径—— 海外华人学者的回应

所幸的是, 上世纪初以来,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中, 有一个从事中国研究的海外华人群体, 一直充当着中国作品译介的主力军。他们致力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英译和传播, 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评论, 就如何理解原作及如何使用英语表达原作的思想内涵, 直接诉诸英美读书界。

安乐哲和郝大维英译的《中庸》由夏威夷大学 2001 年出版。该书出版后不到三年, 《比较哲学》(Dao: Comparative Philosophy) 2004 年专出一期, 刊登了倪培民、李晨阳和温海明等华人学者对安译《中庸》的评论文章, 肯定了安氏、郝氏对中国哲学术语英译的创新, 回应了西方学者的质疑。

(一)从实体语言到过程语言

倪培民系美国大河谷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东亚研究项目主任。他的文章评介了安乐哲和郝大维的《中庸》英译, 特别就其中关键词的译名能否传递儒学教义中“功夫”指导的意义做了详细的评论。倪氏承认《中庸》所蕴含的形上学是非实体的, 因此, 他赞同译者们采用过程性的词汇, 或者, 用译者们的话来说, 用“点和域的语言”来阐明《中庸》所反映的形上学思想, 认为此举“对于揭示《中庸》中所蕴含的整体性和动态的世界观极具深意, 它迫使人们在诠释儒家经典的时候对浸透了形上学意蕴的语词保持清醒的警觉”^[11]。但是, 他认为两位译者对形上学的强调, 反而遮蔽了《中庸》的另

谭晓丽,吕剑兰

外一个重要层面——功夫指导的层面。倪氏认为,儒家的修身养性完全可以被称为“儒家功夫”,即“一套有关修身养性的功法及其功能、功力、功用和功效的学说”^[9]。安氏与郝氏对《中庸》的翻译注重形上学的过程语言与实体语言的对比,却忽视了书中功夫的层面。他用安氏和郝氏对“中”、“庸”、“诚”几个关键词的英译举例说明了这些译名未能反映原作的功夫指导的意义。例如“中”译为“focus”虽能表达场域的意思,却完全抹杀了其“过”与“不及”这两端之间的“中”这层含意。“庸”的译名为“familiar”,是一个描述经验的词,而“平常”却是带有判断的词。一些人很熟悉的事,却不一定是人类生活中平常、一般的事。不过,倪氏相信,“虽然安、郝对《中庸》的翻译处理未能对其功夫指导的层面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所做的从实体语言到过程语言的转化却为进一步揭示其功夫的层面打下了基础”^[9]。

(二)“点和域”语言的使用

夏威夷大学博士、安乐哲的学生温海明的评论文章高度评价了安乐哲和郝大维的《中庸》英译,认为该译作为反思和改进中国哲学的解读和翻译提供了机遇。评论回顾了“中庸”这一术语的英译历程,通过翻译实例详细说明译者使用的“点和域”的语言对于翻译中国思想的优势。评论认为,安乐哲和郝大维的中国哲学术语英译不仅纠正了西方汉学家的误读,也是对术语在自身传统中如何还原其本原意义的一种反思。例如,译者使用“creativity”而非“sincerity”作为“诚”的译名,目的是传达其“动态的、能产生新意的活动,让人类在自我和天地结合的活动中实现自我”这一意义^{[9][30]}。其次,在自身传统里重新审视和解读中国哲学十分有必要。20世纪初“中国哲学”的原初建构,诸如胡适和冯友兰著作中关于中国哲学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哲学话语的影响。安氏和郝氏使用的“点和域”语言建立在对中国哲学更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取代了以往基督教式的语言和西方哲学式的语言。评论指出,当两种哲学相遇时,有必要建构新的哲学术语。读者们也必须摒弃传统上有关这些概念的误读,对之予以重新理解。安乐哲和郝大维创造的“点和域”的语言将会成为中国哲学术语英译的一块基石^[10]。

(三)哲学术语英译的创新

另一篇评论文章《作为“大和”的中庸:安乐哲、郝大维译本的另类解读》的作者李晨阳供职于美国中央华盛顿大学。他称安乐哲和郝大维的《中庸》译本为“近年来有关《中庸》研究的最有雄心、最具创新也是最重要的作品”^[11]。在哲学观上,李晨阳赞同两位译者运用非物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的方法解读和翻译《中庸》。在他看来,“诚”这一概念的创造性英译堪称是对中国哲学术语英译的一大贡献。但是,李晨阳认为,安氏和郝氏未能清楚说明《中庸》是如何有益于人类生活——帮助人们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而这一境界又是创造和鼓舞世界的源泉。因此,他把“中庸”译为“equilibrium moderation”,以“适时”、“时中”为特点,认为,君子履行中道之时,需要契合具体的时间和情况,才能和天、地、人保持和谐的关系。

从以上评论对权威书评意见提出的异议来看,英美的读书意见网络并非完全封闭固化,仍存在着通过讨论及争议影响并改变舆论氛围的空间。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学者认同译者的哲学观,有力地反驳了那种认为译者的哲学观具有“本质主义”特征的论调。不过,译者学生的参与难免让人觉得不如旁人那样客观公允,使得支持译作的声音总体上弱于反对的声音。

三、安乐哲译作国际评论的反思

“翻译作品要想融入新的语境,作品应该被译成‘可激活文本’”^[12]。从以上安乐哲的中国哲学典籍译作的国际出版和评论情况来看,安氏等人的译作显然属于“可激活”的文本:所有英译本均由美国知名的出版社出版,部分译作出版后不久就有权威的学术刊物发表译评。究其原因,安氏译作在翻译选材和整体风格方面颇能契合美国当代读者的需求。

从翻译选材来看,恰逢当代美国“中国典籍翻译的第二次高潮”^[13],安氏选择了《孙子兵法》、《道德经》和《论语》等西方最受欢迎的中国典籍,来回应读者们当下的“具体关注、渴求、情趣、焦虑和失落”^[12]。例如,《孙子兵法》为二战后的美国军界和商界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战术的参考。《道德经》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为解决当前全球面临的人类和环境

关系的问题提供了思想启迪。《道德经》独有的养身之道和休养心法,也有医治现代人心理疾病的潜在功能。据报导,美国大学生对道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倡导的崇尚个人的内在自由不仅契合年轻人的想法,也被认为是消解竞争压力、缓解现代性焦虑的一剂良药^[14]。安乐哲等译者还从《论语》、《中庸》等经典中读出了儒家社群思想,彰显了人类在创造中的积极作用,对克服目前西方社会中充斥的个人主义和客观主义思想有着积极的作用。

从翻译的整体风格来看,安氏译作没有删译、漏译和增译,行文流畅、质量较高、接受性好,即使是持批评意见的 Shcaberger 也承认“他们的翻译是不错的,整个译文甚至行话的接受性都还不错”^[12]。这不仅仅是评论者的主观判断,译作的销售数字也显示了一定的说服力。“近年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英语作家的代表作英译在亚马逊网上书店销售排行榜上能位列万名之后十万名之内已属难得,所有主要著作的英文版在这一榜上都只列几十万名的也并非不可思议,连尚未售出过的新书都在打折促销的则比比皆是”^[12]。著名的翻译理论家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在谈及中国哲学作品英译在美国的传播情况时曾说过:“众所周知,任何类型的翻译作品对美国读者来说都不具吸引力。比来自欧洲国家的小说,中国小说英译的魅力要小得多,而任何国家的哲学作品的英译又远不如它们的小说英译能吸引美国读者”(引自 Robinson 与笔者的通信)。

在这样的生存逆境中,回顾安乐哲译作在亚马逊图书网上的销售排名情况:《论语》英译排第 53,377 位,《孙子兵法》英译排第 61,804 位,这两部译作的销售排名均位列几十万名之内,实属不易。但其他几部译作的销售排名则不容乐观:《孝经》英译本的销售排名为第 143,524 位,SUNY 版《孙膑兵法》排名为第 912,264 位,《中庸》第 1,050,465 位,《淮南子·原道篇》第 1,183,406 位,Ballantine 版《孙膑兵法》第 2,463,469 位。后几部译作惨淡的销售数字与它们的原作在西方大多不为人知,尤其不为大众读者所知有很大关系。

从哲学术语的翻译方法来看,译者使用了新的译法来表现术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但是,使用新造词,或大量使用动名词组使得译名笨拙别扭。

这些方法不仅遭到了普通读者的反对,也不为学界认同。由此看来,译者并非很在意“目标社群特有的情趣及价值”^[12],或对其读书界实际上采用的评判标准有所考虑。

当然,译者可能以为,自己译作的目标读者是学界的专业人士,因此对读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即便学界也并非喜欢这种刻板生硬、通过注释才能理解的译名,这从本文列举的几篇西方本土学者的评论就可见一斑。安乐哲及合作者在中国哲学术语翻译实践中,大量使用了音译法和创译法,忽略了 50、60 年代以来美国学界盛行的术语英译的原则和评判标准,这或许是他们遭到学界诟病的原因之一。

西方的大众读者更是缺乏为真正了解其他文化传统而付出艰辛努力的勇气。著名的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an Owen)在“什么是世界诗歌”一文中,谈到西方读者的诗学情趣时说道:“他们(西方读者)感兴趣的是那种使他们骨子里觉得熟悉(essentially familiar)同时又因为带有某些地域色彩及异域主题而略显陌生的译诗”^[15]。他还认为,这些读者“所寻求的绝非诗歌本身,而只是用以观察其他文化现象的窗口”(同上)。这话同样适用于英语世界读者对中国哲学译作的鉴赏。例如,Stephen Mitchell 的《道德经》英译明显引入了基督教和西方哲学的视角,译作却取得了极好的市场效益,在亚马逊图书网的销量排名为第 3489 名,遥遥领先于许多哲学大师和文学巨匠作品的译本,也比《道德经》的其它英译本排名更靠前^[16],原因在于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更愿意享受被归化、简化和同化过的“假翻译”带给他们的舒适感。在亚马逊图书网上,Stephen Mitchell 的《道德经》英译不仅销量排名位居前茅,获得的评论也是最多的。如“Mitchell 看透了一些译作中臭臭的学究味,他的译作是轻而易举的改写”,“Mitchell 的译作没有歧视性的语言,举例得当,向当代西方人展示了怎样理解和接受道学这种智慧且简单的哲学”^[17],这样的评论在 Amazon 网站上比比皆是。

四、中国哲学如何走出去—— 安乐哲译作国际评论的启示

如何改善中国哲学典籍译作在英语世界的接

谭晓丽,吕剑兰

受效果?出于对译评重要性的考虑,刘亚猛和朱纯深提议要“倾听、参与和干预”国际涉华译评^[210]。

首先,要倾听西方学界对待学术作品的要求。从理论的逻辑性来看,安乐哲与合作者对中国哲学和古汉语的个别假设和推理表现出一点混乱及自相矛盾,违背了西方学术界对于推理逻辑的严格要求。例如,有关古汉语的视觉假设与译者们提出的依据文化语境解读文本的主张互不相容。这种缺陷影响了译作的接受性。美国文化从不固步自封,具有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因此在美国,从学者到大众读者,对有创新解读的译作颇感兴趣。上文提到过的美国学者道格拉斯·罗宾逊在一次国际翻译研讨会(International Summit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New Orientations, 2015)上曾对笔者说过,他所关注的是译作的创新,而并非它与原作的相似度。虽说安氏译作以对中国哲学的独特理解和关键词的创新译法而取胜,但对原文本的解读大多倚仗传统注释,并无多少新意,这或许是其译作被批评为脱离文本^[19],不关心翻译问题^[2]的主要原因。

其次,要倾听读者对哲学术语英译的接受标准。若想让译作既能在学界通行又能获得大众读者的青睐,译者就需考虑,如何让关键词的英译在揭示中国思想内涵的同时,能改进得更通俗一些。如倪培民提议用“centering the commonality”作为“中庸”的译名,既可以利用动名词突显汉语的动态性,又能表达该词的基本内涵,比安乐哲和郝大维的“focusing the familiar”要平易浅显^[9]。不仅海外的华人学者要担当起国际对话的责任,中国的哲学界、译学界和比较文学界也应当关注域外的涉华书评,并利用各种机会促使西方朝着重视和积极评价英译中国作品的方向演变,但事实并非如此。国内译学界对英美翻译家除了表达欣赏和钦佩,从技术层面对其译作是否忠实于原文提出些许批评,未见通过认真的对话和商榷,讨论其译作如何真正做到“接地气”——即真正使广大国际读者乐于接受。以安乐哲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为例,国内赞扬声不计其数,反对意见却寥寥无几。极个别持保留意见的学者,如孙周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汉语如何可能表达异质的西方哲学思维?我们是否需要以及如何防止把中国传统思

想“哲学化”^[19]?虽直指文化交流的过度诠释问题,却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案。中国学者可以主动发起与英美相关译者的对话,与他们共同探讨的话题可包括目标读者的定位和译作相关问题等等。例如,安乐哲把自己译作的读者定位为研究哲学的专业人士,这必定是个小众圈子。笔者在对安乐哲先生进行访谈时,谈及其译作在美国的销量和接受情况,安先生把话题转向中国,说其著作和译作在中国接受效果很好,几乎每部都有中译本^{[20][39]}。当然,安乐哲的话不无道理,他关心的是自己的理论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中国读者的认同可算是对其理论学说和翻译的最大肯定。但译学和比较文学界关注的问题则不同,对他们来说,安氏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效果或许是更有意义的话题。这个差异,使得我们与相关英美译者的共同探讨显得更有必要。译评不仅是学者们交流阅读感受,发表个人见解的场所,也是在接受文化语境中形塑公众的阅读习惯、阐释策略及价值判断的重要工具。安乐哲在接受笔者访谈时也承认,在美国,除了翻译评论之外,没有什么政策能够影响译者的选材和翻译策略^[20]。因此,国内学者必须高度重视国际译评。考察译作在接受语境中的阅读情况,就应时刻关注那些发布于权威平台、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巨大号召力的国际译评,深刻领会体现于其中的情趣、品味、标准及期待。中国学者可以利用“读者来信”、跟帖等形式回应这些译评,然后逐步争取在这些平台上就如何理解、欣赏作品在接受体系内所具有的相关性及艺术价值,直接诉诸欧美读书界。

此外,打造国际化的学术期刊,可以促进中国哲学与海外同行之间的交流与探讨,营造翻译评论与翻译实践和研究的良好氛围。2006年1月,由教育部发起、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德国Springer出版公司负责海外发行的全英文哲学类季刊——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简称FPC)正式创刊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和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为FPC的学术支持单位。作为中国第一本面向海外发行的英文哲学类专门期刊,FPC一经问世,就引起国际哲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FPC已成为世界学者了解中国哲学研究成果与发展动向的重要平台。诸如此类的学

术期刊可以进一步开发,并刊发中国学者的译评,从而在与国外期刊的互动和交流中,相互认识、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1] 安乐哲,田辰山.让中国哲学讲中国话[N].人民日报. 2015-08-10.

[2] Schaberg, David. "Sell it! Sell it!": Recent Translations of Lunyu[J].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23(Dec.),2001.

[3] Cheang, Alice W. The Master's Voice: On Reading,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J]. The Review of Politics, 2000,62(3).

[4] Makeham, J. The Review of The Original Analects: Sayings of Confucius and His Successors an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J].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Vol.6, No. 1, Spring, 1999.

[5] Richery, Jeffrey L, A Review of The Chinese Classic of Family Reverence: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of the Xiaojing[J].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2010(2).

[6] DAO DE JING: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N].Publishers Weekly. 2002-12-23.

[7] www.amazon.com/Dao-Jing-Philosophical-Translation-Laozi/dp/0345444159/ref=sr_1_4?s=books&ie=UTF8&qid=1475670107&sr=1-4

[8] Ni, P. Reading Zhongyong as a Gongfu Instruction[J].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2004(2).

[9] Ames, Roger T. & Hall, David. Focusing the Familiar: A Translation and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Zhongyong[M].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

[10] Wen, Haiming. From Substance Language to Vocabulary

aries of Process and Change: Translations of Key Philosophical Terms in the Zhongyong[J].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2004, Vol. III, No. 2.

[11] Li, Chenyang. Zhongyong as Grand Harmony: An Alternative Reading to Ames and Hall's Focusing the Familiar[J].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2004, Vol. III, No. 2.

[12] 刘亚猛,朱纯深.国际译评与中国文学在域外的“活跃存在”[J].中国翻译, 2015(1).

[13] 杨静.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论[D].河南大学,2014.

[14] 刘晨.哈佛大学如何上“中国文化通识课”[N].文汇报. 2014-02-13.

[15] Owen, Stephen. What is Poetry? [J].The New Public, Nov. 19. 1990.

[16] Goldin, Paul R. Those who Don't Know Speak: Translations of the Daodejing by People Who Do Not Know Chinese[J].Asian Philosophy, Vol. 12, No. 3, 2002.

[17] http://www.amazon.com/Tao-Te-Ching-Perennial-Classics/dp/0061142662/ref=sr_1_1?ie=UTF8&qid=1475670666&sr=8-1&keywords=Stephen+Mitchell

[18] 冯耀明.当代东亚儒学的主要课题与研究进路[C]//刘笑敢.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四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9] 孙周兴.学术翻译的几个原则——以海德格尔著作之汉译为例证[J].中国翻译,2008(4).

[20] Tan, Xiaoli & Huang, T. Translating Chinese philosophy on its own term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Roger T. Ames[J].Asia Pacific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2015(2).

责任编辑 君 羊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s of Roger T. Ame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Classics

TAN Xiao-li, LYU Jian-l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2, China)

Abstract: Roger T Ame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Classics is highly praised in China for "helping Chinese philosophy speaking on its own terms". However, the number of readers it attracts in the world of English is kept unknown. Attention should be diverted to the relevant reviews in English world since they tend to shape international reader's opinion. Based on a survey of the book reviews and sales volumes of Roger T Ames's translated works, this article ha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acceptance of the books in the US, points out some problems Chinese philosophy is faced with on its' way of "going out" and proposes some measur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world of English.

Key words: Roger T Ame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classics; international reviews of translation; acceptance; influence